

难舍帝国情结

——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的《阿尔迈耶的愚蠢》

赵君侗¹, 石云龙²

(1. 常州市广播电视大学 文法学院, 常州 213001; 2.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0016)

摘要: 运用新历史主义的颠覆、抑制、协和等相关理论, 深入分析波兰裔英国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的首部作品《阿尔迈耶的愚蠢》彰显出的对帝国的爱憎, 指出作品呈现帝国意识的颠覆与抑制的并置并最终导向协和, 体现了康拉德对帝国情结的难舍。

关键词: 《阿尔迈耶的愚蠢》; 新历史主义; 颠覆; 抑制; 协和; 帝国情结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12)01-0062-05

Conrad's Inseparable Imperialistic Complex

— A New Historicist Study of *Almayer's Folly*

Zhao Junyi¹, Shi Yunlong²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CZTVU, Changzhou 213001, China; 2.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Nanjing 2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analyzes Conrad's love and hate toward the empire in his first novel *Almayer's Fo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new historicist theory. Based on the text analysis, the paper reveals Conrad's subversion to imperialistic consciousness, his containment by it and the following negotiation with it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Conrad's inseparable imperialistic complex.

Key words: *Almayer's Folly*; new historicism; subversion; containment; negotiation; imperialistic complex

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在英国文学史上“与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等著名小说家齐名, 共同构成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1]。他的作品以博大深邃的思想底蕴、匠心独具的结构设计、纯熟完美的写作技巧和生动逼真的心理刻画享誉西方文坛。泰德·比利(Ted Billy)甚至认为, “没有任何小说家(也许乔伊斯除外)对20世纪小说的影响堪与约瑟夫·康拉德相提并论”^[2]。

康拉德的作品蕴涵深刻, 原始与文明的对立、

陆地与海洋的冲突, 尤其对帝国的爱憎纠结表现得最为鲜明。走进康拉德的文本世界, 可以发现, 由于康拉德的欧洲文化语境和帝国背景, 他对帝国情结的难舍难分早在首部作品《阿尔迈耶的愚蠢》中已彰显无疑。这部作品一经发表便广受赞誉, 门肯称之为“绝对天才之作”^[3]。处女作的成功对其写作生涯与写作观的形成更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 学界对康拉德研究多聚焦于《黑暗的心脏》、《吉姆爷》等小说, 对《阿尔迈耶的愚蠢》的研究探讨

收稿日期: 2011-10-11

作者简介: 赵君侗(1983-), 女, 讲师。研究方向: 英美文学。E-mail: zhaojunyi198342@sina.com

不足,有关该小说的系统性文学评述较少。本文将这部作者早年以东方题材创作的马来小说置入新历史主义理论的视阈中,借助文本分析深入剖析小说中显现出的康拉德对帝国意识的颠覆与所受抑制的并置,以及最终呈现的协和,进而揭示康拉德难舍的帝国情结。

一、颠覆:拒斥帝国意识

《阿尔迈耶的愚蠢》诞生之时,正值传统保守的维多利亚道德规范盛行,弱肉强食的殖民观念根植于整个欧洲大陆。当时的主流文学殖民探险小说都积极服务于帝国主义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康拉德的童年遭遇和海员经历使他相对英国主流作家对整个社会的关注更加细致、敏感。在首部小说中,他表现出对主流意识诸多不满,并进行了反抗性颠覆。在康拉德的小说中展现的诸多颠覆与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颠覆”与“抑制”观点极为相似。后者认为,颠覆是保障统治权利的必要手段,但“这种颠覆的声音产生于对秩序的确保,并被后者有力地表现出来,它并不侵蚀秩序的根基”^[4]。颠覆最终会被权利所压制,不过,颠覆的存在是必要和可被感知的。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主题思想和审美态度,充斥着二元认知思维模式和集体意识:白人优秀、欧洲中心和殖民兴盛论。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为殖民事业和海外扩张奠定了基础,成为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康拉德在《阿尔迈耶的愚蠢》中对此作出了种种颠覆,颠覆即意味着作者对帝国意识的质疑和清醒自觉的批判,因此值得关注。

康拉德在《阿尔迈耶的愚蠢》中对白人的种族观予以颠覆。作者对白人种族观的颠覆是其对帝国意识深刻反省的重要表现。白人种族观是英帝国时代传统意识形态中最突出的认知观点。种族观不仅划分种族肤色的差异,还强调文化和社会等级的差异。他们崇尚白人的文明和高贵,贬低非白人种族,认为他们低劣、孱弱,具有野蛮行为方式和生活习性。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观念中,白人是最优秀的种族,具有“勇敢”、“智慧”等优越特质,代表着文明与光明,其他的非白人,无论是马来人、中国人、非洲人等有色人种都无法与白人相比,他们代表的是野蛮与落后,需要白人救赎与拯救。这种意识形态在西方人那里根深蒂固。达尔文主义的产生更是为白人的种族观提供了所谓的“科学依据”。康拉德虽受传统种族观的影响,但却与同时代作家不同,他并未对非白人作出贬低性、近乎污蔑性的表述,

而是在小说中通过对主人公阿尔迈耶的塑造,颠覆了“白人优秀”的种族主义观念。

康拉德笔下的阿尔迈耶一反传统形象,成了一个孤僻、懦弱并整天沉迷于幻想的白人殖民者。他身上既体现不出白人优越主义的“中心”地位,也缺乏帝国英雄式的勇敢和智慧。阿尔迈耶这个“东部海岸上最后一个白人”^{[5]155}的失败和死亡,对颠覆“白人优越”观念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康拉德对白人的种族偏见也进行了颠覆。受白人优越论影响,白人眼里的有色人种通常是原始、愚昧、无知、暴力和兽欲的代名词,他们唯一的用处就是在帝国殖民事业的开拓进程中被加以利用。但是,在《阿尔迈耶的愚蠢》中,被白种人当作低下的有色人种,无论是马来土著人巴巴拉蚩还是阿拉伯人阿卜杜拉,都凭着自己的智慧在赛必尔的权利更迭和贸易交往中占据了上风。作者刻意表现了他们的智慧和勇敢,轻而易举地颠覆了白人的种族歧视,动摇了帝国意识的思想基础。

康拉德在拒斥保守的传统意识、颠覆白人优秀的种族观的同时,在《阿尔迈耶的愚蠢》中消解了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价值观为帝国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19世纪的英国,盛行欧洲传统意识形态下的道德观,提倡“夫权”和“父权”的性别优越,宣扬“帝国英雄主义”、“绅士行为”和“骑士精神”。这些观念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为帝国主义和殖民事业奠定了有力的思想基础。然而,康拉德却在小说中利用对白人阿尔迈耶和有色女性人物等的塑造,在有力批判西方的男权帝制,质疑、拒斥帝国意识的同时,颠覆了欧洲传统的白人道德观。

欧洲白人相信完美的道德观,认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白人殖民者实现“自身价值”的方式多种多样,但是,康拉德却展示了阿尔迈耶的懦夫行为,与白人公认应该具备的勇敢、冒险、忠诚的品质全然不同,这显然违背了白人传统的道德准则,与欧洲传统道德观下的殖民者形象大相径庭。阿尔迈耶也曾胸怀雄心壮志,“准备征服世界”^{[5]6},并从不怀疑自己的成功和获得财富的可能性。但是,他在林格“没有人会在意你妻子的肤色……金钱可以掩盖这一切”^{[5]10}的引诱下,以自己的婚姻和尊严作为代价去换取财富和地位,违背了白人颂扬的用奋斗和冒险去实现价值的道德观。阿尔迈耶本人为此感到耻辱,这种“卖身求荣”的行为也遭到了马来土著人的耻笑。阿尔迈耶的懦夫式行为是对白人道德优越的极

大挑战和颠覆。

欧洲传统的价值观中男权思想严重,认为有色女性没有自由意识,更无法承担社会责任,唯一的作用便是传宗接代。有色女性受到男性中心主义和帝国意识形态的双重压迫。然而,康拉德在小说中一反传统,塑造了敢于反抗父权、自由选择婚姻的混血女性形象妮娜,甚至还塑造了另一位连名字都没有的女性人物,她先是被称作“马来女孩”、“林格的女儿”,继而被称作“阿尔迈耶太太”。因为,她似乎寄生于男权主义之下,“没有权利做任何事,只能做她被命名的那个人”^[6]。她被迫接受白人教育,改变宗教信仰,被利用和厌恶。不过,即便是这个无名人物,也颠覆了白人意识中的有色女性形象。“她隐藏起自己对所有新生活的痛恨和蔑视,平静而温顺地承受这一切”^{[5]20},但却不甘心于男性中心主义和帝国意识形态的双重压迫,暗中支持并协助女儿摆脱种种传统价值的束缚,争取权利和自由,最终自己也背弃了双重压迫的象征——丈夫阿尔迈耶。

康拉德不仅设法颠覆白人种族观、传统的价值观,而且在小说中谴责了帝国主义殖民有益论。帝国主义殖民有益论是帝国意识发展和巩固的重要表现形式,也是帝国意识形态给殖民者洗脑的冠冕堂皇的借口。作者对殖民有益论做出颠覆的本身意味着他对帝国意识的批判和拒斥。康拉德所处的时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盛行,“文明”和“救赎”被当作帝国主义殖民的象征。帝国主义打着“传播文明”的旗号,借口帝国主义给殖民地带来进步和文明而大肆侵略和殖民扩张。康拉德早期的海员经历使其有机会接触到殖民地和殖民地人民的真实生活,殖民侵略给殖民地带来的是光明还是黑暗,康拉德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他罔顾曾经受到的帝国主义殖民思想的影响,在小说中刻意展现殖民对殖民地人民所带来的伤害,揭露殖民在“进步”、“文明”的幌子下大行殖民掠夺之实的种种罪恶,以事实对殖民有益论提出了挑战,尤其通过殖民地被殖民前后的对比,通过殖民地国家在被殖民过程中越发落后和凋敝,颠覆了帝国主义殖民有益论,质疑了帝国意识。

《阿尔迈耶的愚蠢》中,“20年前的赛必尔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商业贸易活动频繁而有序”^{[5]7},吸引了大批像阿尔迈耶这样的殖民淘金者前来实现淘金梦。按照殖民有益论的说法,这些西方的文明人所进行的诸多商业活动理应带来繁荣和进步。而20年后的赛必尔却伤痕累累,无数次的纷争把它推向了衰败。此外,殖民者的失败和悲剧结局也有力地

颠覆了殖民有益论。殖民者来到殖民地是为了获得财富和实现自己的价值,阿尔迈耶和林格都是这样的代表。阿尔迈耶怀揣梦想从荷兰来到赛必尔寻求成功的机遇,为了“回到欧洲过上体面而受人尊敬的生活”^{[5]7}甚至不惜牺牲婚姻和“白人的尊严”。而曾经的“海上大王”林格在经历了“辉煌”之后,等待他的是心灵的愧疚和落魄消失。康拉德通过阿尔迈耶和林格的遭遇极大地讽刺和批判了帝国意识的殖民有益论。赛必尔被侵略后的凋敝现状和殖民者的失败结局都表明,不管是对殖民地还是殖民者本身而言,帝国主义殖民都是“挣扎和悲苦”^{[5]40}。

二、抑制:受制帝国意识

每个人都受到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环境的影响,作家也不可避免。康拉德生活在帝国观念盛行及帝国主义者横行全球的年代,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作家,他不可能是孤立的存在。无论是选择加入英国国籍,还是选择采用非母语英语进行文学创作,都可见他对帝国制度和思想意识的融合和赞同,康拉德觉得,“从法国到英国……从思想到制度没有丝毫的不适应”^[7]。新历史主义认为,颠覆受到抑制的控制……通过抑制颠覆来强化统治^[8]。康拉德在小说中的颠覆只是承认帝国事业在前进的过程中存在弊端,这并不影响帝国情结在他心中的滋生和驻扎,更不能产生决定性的力量,原因在于颠覆最终受到他根深蒂固的帝国意识的抑制和禁锢。

因帝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康拉德受制于传统的白人种族观。西方的种族观“白人中心”和种族歧视宣扬的是白人的高贵和有色人种的低劣,严格地区分着“我们”与“他们”、“文明”与“野蛮”。在《阿尔迈耶的愚蠢》的创作中,康拉德受制于强烈的种族歧视意识。小说以第三人称视角开始,但是,不断加入的评价和描写显示了作者强烈的种族偏见。故事的开头,主人公的幻想被妻子“熟悉的尖叫声”所打断,并对此“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讨厌”^{[5]5}。在阿尔迈耶的眼中,“处置一个马来女人,一个奴隶是易如反掌的”^{[5]11}。小说中不管是马来土著人兰康白、巴勃拉托其,抑或是阿拉伯人阿布杜拉,他们懦弱、卑微、古怪,靠卖苦力为生。不得不提的是,阿尔迈耶最后就是在他的中国邻居的影响下吸食鸦片。康拉德受制于白人种族观,在帝国意识的抑制下产生的种族假想显露无疑。

因帝国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康拉德受制于欧洲

中心主义。首先,他受制于潜意识中的“欧洲中心”。许多作家受到种族偏见和欧洲中心思想的影响,在文学写作中一旦涉及异族文化和殖民地,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将那里的人物、环境、文化与欧洲世界加以比对,进而纳入程式化表述: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后等。《阿尔迈耶的愚蠢》是以东方马来为背景,但小说中缺场的欧洲经常以各种形式出现。“远离这个东方海岛,居住在欧洲……”^{[5]5},回归欧洲是支撑阿尔迈耶一生的信念,这个缺场的欧洲在小说中无处不在。而作者笔下的赛必尔四处凋敝凌乱,“到处充斥着死一般的寂静”。“文明与落后、天堂与地狱”是作者展示的东西方世界的反差。其次,康拉德受制于传统的西方宗教意识、文化思想。在小说中,不管是阿尔迈耶还是林格无不希望自己的亲人和血脉可以接受西方的宗教和文化。林格强制养女改变宗教信仰,接受西方的教育,而妮娜在很小时便被送走接受传统的西方教育。在白人心目中,西方世界永远是文明、优越的,西方的传统价值观根植于他们的思想。康拉德同时也受制于传统的男权和父权思想为代表的西方传统的价值观。康拉德在小说中展现了妮娜及其母亲对于父权和夫权的颠覆,但是颠覆的结果是,妮娜仍然需要依托于丈夫,遵循母亲的劝导“在男人生气时必须颤抖,让他看到你的害怕”^{[5]117},这意味着妮娜虽然违背了父亲,但仍必须服从丈夫的意志。她的母亲在背弃丈夫后仍要依靠兰康白的庇护得以生存。女性反抗的结局依旧脱离不了男性世界的掌控。在康拉德的思想中,传统的男权是至高无上的。

康拉德的思想中除浸润了种族意识和传统价值观,还受制于帝国殖民意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宣扬殖民是一项“公平”的贸易,西方人获得原材料和劳动力,而“野蛮和落后”的土著人获得“文明”和“救赎”。他们甚至认为殖民是一种“使命”。康拉德曾在一份信件中提到,“只有在英国国旗统治下的殖民地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9]。康拉德受制于帝国殖民意识主要表现在他对殖民者同情的态度上。阿尔迈耶从没从“美梦”中清醒过来,在遭遇女儿的反叛后仍然“用某种语气和话语对一个小孩子说话”^{[5]158},不愿回到现实。康拉德为阿尔迈耶的遭遇积极地营造使人同情的描述,让人不禁认为这是个可怜人而非自私自利的殖民者。此外,曾经的“海上大王”林格,在年老衰弱和殖民探险失败后到底去了何方,被作者刻意含糊的描述所掩盖。康拉德给予阿尔迈耶失败的同情和

对林格结局的隐晦足以证明,他对帝国的殖民仍然怀有希望。

就像赛义德断言的那样,“每一个欧洲人……最终都会成为一个种族主义者,一个帝国主义者”^[10]。康拉德这样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作家……自觉不自觉的成了帝国的一部分”,“在支持帝国幻想方面扮演了不可估量的角色”^[11]。根据新历史主义的观点,抑制是不可阻挡的,它将一定程度上的质疑和颠覆都控制在许可范围之内,并保证颠覆不会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充分展现出康拉德受制于帝国思想意识。

三、协和:回归帝国意识

格林布拉特在论述文学社会功能时,提出了“协合”理论,认为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社会能量”可以通过协和而相互包容和统一^[12]。“协和”在两种相互交织的“颠覆”与“抑制”能量之间不断运作,将不可调和的调和,不可相容的相容,从而达到共存和稳定。小说《阿尔迈耶的愚蠢》中渗透的协合意识,与格林布拉特的文学“协合”功能寓意相同。协合不是折衷,而是作者的思想意识和作品复杂性的体现。康拉德在小说的建构中,通过文本和历史的协和,在颠覆与抑制的交织中回归帝国的意识,作者的主体意识和小说文本以及当时的历史语境达到协和。

康拉德对帝国意识的回归首先体现在小说中殖民者人性的协和。康拉德用林格和阿尔迈耶这样的殖民者人性的协和来凸显殖民者正面和道德的一面,在帝国意识的支配下为殖民者在人性上寻找有利证据。《阿尔迈耶的愚蠢》中的殖民者具有人性的弱点,但在殖民利益面前并没有丧失人性。曾经的“海上大王”林格在战争中凶残冷酷,但却义无反顾地收养了“满船海盗的遗孤”^{[5]10}。林格对海盗残忍无情,而对于凄凉无助的14岁马来遗孤却充满了愧疚和同情,“是我把她变成了孤儿”,我有义务“为那个女孩尽责任”^{[5]20}。林格称呼她为“我的女儿”,承诺“会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她,并发誓将她嫁给白人”^{[5]8},让她过上白人“高贵”的生活。林格收养海盗遗孤的行为被作者塑造为人性向善的一面,康拉德在殖民者人性的残忍和善良之间做出了协和,为殖民者的形象加以正面的显示。此外,在阿尔迈耶的人性塑造上,康拉德在描写他追逐成功和财富的过程中,暴露出他的自私自利、唯利是图,但阿尔迈耶对女儿妮娜则舐犊情深,更是在女儿背弃的

痛苦中郁郁而终。康拉德对殖民者人性的协和表明了他对帝国殖民者的同情,割舍不下那份帝国情结。

康拉德对帝国意识的回归其次表现在对殖民者失败原因的协和。评论家伊安·瓦特在《康拉德在19世纪》一书中提到,虽然《阿尔迈耶的愚蠢》中大量的人物、地名和情节皆源自现实,但康拉德还是做了一些刻意的删减和修改。在瓦特看来,康拉德的修改正是对主人公失败原因的安排,在小说的文本建构中积极为殖民事业寻找有利的一面。小说与历史事实主要的区别:当初和阿尔迈耶一起来到马来的还有其他三位白人,而并非小说中的阿尔迈耶一人;阿尔迈耶和妻子育有四个儿女,而并非小说所讲述的一个混血女儿。对于阿尔迈耶而言,没有其他白人的存在就等同于没有可以言说和沟通的对象。在他者世界中充满无助和孤独,这也就为他用婚姻换取财富做出了解释。一个白人在马来世界想要取得成功并非易事,所以阿尔迈耶做出这个决定也有一定的无奈,为他获取一定的同情。此外,只有唯一的女儿而不是四个儿女更加可以合理解释,妮娜是他梦想的延续,妮娜的背离摧毁了他所有的梦想而彻底失败。此外,康拉德对林格的失败也作了袒护。当林格还在偏好原始的帆船时,阿拉伯人早已开始操纵先进的汽船了,交通方式的落后导致他在商业领域节节败退。而在小说中,康拉德却把真实原因归结为林格的软弱仁慈和对手的强势。康拉德在阿尔迈耶和林格的失败原因上所做出的协和充分说明对帝国的殖民事业仍然心存幻想。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的作用就是通过“协和”将产生的“颠覆”与受到的“抑制”变为统一的文本,这也是作家主体性的体现。康拉德在小说中对殖民者人性、对殖民者失败原因以及对马来殖民历史的协和正是他将其对帝国意识的颠覆与所受的抑制调和、运作的结果。而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帝国情结的难舍,深受帝国意识形态的影响而难以自拔。

四、结论

《阿尔迈耶的愚蠢》中展现出康拉德对帝国意

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给予的颠覆和违背,而这种颠覆最终受到根深蒂固的帝国意识的抑制和禁锢。这种看似相悖的两条线在文本建构中相互调和与兼容,康拉德在颠覆与抑制的交织中达到“协和”,选择回归帝国意识。在“颠覆”、受“抑制”、达到“协和”这一过程中,作者的主体意识、小说文本以及当时的历史语境达到共融,深刻表现出康拉德难舍的帝国情结。

参考文献:

- [1]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M]. London: Chatto and Windus, 1972: 18.
- [2] Billy T. Critical Essays on Joseph Conrad[M]. Boston: G. K. Hall and Company, 1987: 1.
- [3] Watt I. "Introduction" to *Almayer's Folly*[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93.
- [4] Greenblatt S. *Shakespearean Negotiations: The Cultural of Social Energ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M].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 52.
- [5] Conrad J. *Almayer's Folly*[M]. London: Everyman Citymap Guides, 2005.
- [6] Nadelhaft R L. *Joseph Conrad*[M].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22.
- [7] 赵启光.《康拉德小说选》译本序[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5.
- [8] 杨正润. 文学的“颠覆”和“抑制”[J]. 外国文学评论, 1994, (3): 20-29.
- [9] Karl F R. The Collected Letters of Joseph Conrad (Vol.2)[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230.
- [10] Said E W. *Orientalism*[M]. London: Routledge, 1978: 204.
- [11] 胡经之. 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上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61.
- [12] Hamiton P. *Historicism*[M]. London: Routledge, 1996: 157.